

# 負面黨性與投票抉擇： 2004-2020年臺灣總統選舉的分析\*

李弘繹\*\*、張佑宗\*\*\*

## 《摘要》

以前臺灣在政治精英之間才出現的對立，已延伸到一般群眾裡。尤其在總統選舉時，選民之間以情感而非政策立場的對立，已影響臺灣過去五屆總統選舉的結果。本文以「負面黨性」作為觀察臺灣社會「情感極化」的指標，佐以2004至2020年總統選舉，檢證負面黨性對臺灣總統選舉結果的作用。我們發現自2012年開始，對於特定政黨具有負面黨性的選民，百分比呈現大幅上升的趨勢，在2020年總統大選時，已有4成的國民黨和民進黨支持者對敵對政黨有負面黨性，同時給予敵對政黨有史以來最低分。另一方面，即使控制政黨認同及統獨立場，負面黨性對臺灣選民的投票抉擇仍具有顯著的解釋力。也就是說，投票給某一政黨總統候選人的決定，不僅取決於對該政黨的認同，或對其政策的支持，選民對敵對政黨是否具有負面的評價也成爲一項關鍵指標。

**關鍵詞：**負面黨性、情感極化、總統選舉、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EDS)、臺灣

---

\* 本文初稿發表於2020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作者感謝三位審稿人細心審閱及修改建議，兩位作者同時感謝林懿平在資料分析上的協助。文章內容若有疏漏之處，蓋由兩位作者負責。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E-mail: michaelleresearch@gmail.com。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通訊作者）。E-mail: yutzung@ntu.edu.tw。

## 壹、導論

傳統政治學對政治極化的研究，都認為在政治精英間才會出現激烈的對立。然而，近年來這種極化已延伸到群眾中，不同政黨支持者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看法差距越來越大，不同支持者間情感上也越來越對立。Iyengar率先運用「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這個概念，分析美國政治最新發展趨勢及其重要的政治效應(Iyengar and Krupenkin 2018; Iyengar et al. 2019; Mason and Wronski 2018)。2016年底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J. Trump)靠著操弄種族情結激起美國選民強烈情感極化，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Hillary D. Clinton)(Abramowitz and McCoy 2019)。而2020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不是拜登(Joseph R. Biden Jr.)打敗川普，而是「川普打敗川普」(“Trump defeated himself”)，有太多美國選民因為討厭川普最終選擇把票投給拜登。<sup>1</sup>

近幾年歐美國家對「情感極化」的本質、起因及政治效應，已累積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反觀臺灣學界對於此問題，仍處於相對「低度發展」的階段。<sup>2</sup> 造成社會情感極化的因素，國外學者認為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負面黨性」(negative partisanship)。負面黨性指的是對某一政黨及政黨成員強烈的厭惡(dislike)或憎恨(hostility)；有人又稱為「負面的政黨認同」(negative party identification)(Abramowitz and McCoy 2019; Caruana, McGregor, and Stephenson 2015; Mayer 2017; Medeiros and Noël 2014)。<sup>3</sup>

臺灣社會出現情感極化比美國更早，過去一直被統獨議題所掩蓋。侯文詠針對2004年臺灣總統大選曾寫下〈50%的水餃攤〉一文，描述當時藍綠支持者

<sup>1</sup> Michael D'Antonio. 2020. "Trump defeated himself." *The Boston Globe*. November 7. <https://www.bostonglobe.com/2020/11/07/opinion/trump-defeated-himself/>.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sup>2</sup> 目前臺灣有兩個研究團隊正從事政治或情感極化的研究，一個是政治大學黃紀教授主持的「臺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TIGCR)針對「政治極化」的調查計畫(網站：<https://tigcr.nccu.edu.tw/>)；另一個是臺灣大學張佑宗教授主持的「臺大動態民意調查計畫」(NTUWS)，以網路調查為主，搭配調查實驗設計，觀察台灣情感極化問題(網站：<https://webpageprodvm.ntu.edu.tw/ntuwebsurvey>)。

<sup>3</sup> 光在2021年，著名國際期刊Electoral Studies就出版多篇有關負面黨性的研究，例如Harteveld(2021)，Bolsen與Thornton(2021)，Garzia與Silva(2021)，Weber(2021)。

激烈對立程度：「這是在總統大選期間一個水餃攤的故事…隨著總統大選選情緊繃，哥哥在右半邊爐灶插起泛藍旗幟，弟弟則不甘示弱地在左半邊插滿了泛綠旗幟。支持政黨本是個人自由，水餃原來也不分藍綠的，不過顧客心裡卻不這麼想…支持泛藍陣營的顧客只願意到哥哥的爐灶吃水餃…泛綠的支持者一樣不吃藍色的水餃…綠藍陣營旗幟鮮明，壁壘分明」（侯文詠 2004, 241-244）。張佑宗觀察到討厭民進黨（或候選人），會把票投票給國民黨（或候選人），但他們未必真的喜歡國民黨（或候選人）。討厭國民黨（或候選人），會把票投票給民進黨（或候選人），但他們未必真的喜歡民進黨（或候選人）。「討厭民進黨」與「下架蔡英文」的選民，組成我們所看到的「鋼鐵韓粉」；「反對國民黨」與「不喜歡韓國瑜」的人，成了蔡英文「忠貞支持者」。<sup>4</sup>

負面黨性對臺灣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越來越大，如何正確測量臺灣選民的負面黨性？負面黨性在臺灣發展的趨勢如何？在控制其他變數下（如政黨認同、統獨立場等），負面黨性是否可以解釋臺灣選民的投票抉擇？為了解答上述問題，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段落加以處理。首先，將系統性回顧國內外學者對負面黨性的研究；其次，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第三，提出本文對於負面黨性的測量方法，並說明理由；第四部分為本文的實證資料分析；最後一部分則是本文的結論。<sup>5</sup>

---

<sup>4</sup> 張佑宗，2019，〈解構臺灣2020大選迷思〉，蘋果新聞網，11月19日，<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191119/G3MJNCXAZJXSIWGRQBKKGH67EE/>，檢索日期：2022年3月7日。

<sup>5</sup> 除了研究負面黨性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少數學者強調負面黨性也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意願，例如Caruana、McGregor與Stephenson (2015)分析加拿大2008和2011年兩次選舉，發現負面黨性不只降低選民投給討厭政黨的機率，同時也影響其投票率和政治參與，即使控制政黨認同的情況下結果也是如此。不過，這部分不是本文分析的重點，相關影響仍待後續學者研究。

## 貳、文獻檢閱

最近幾年興起的情感極化與負面黨性研究，源自心理學的社會認同理論 (social identity theory)。社會認同理論主張一個人的團體歸屬感，會影響個人的情緒、態度與行為。因此，Tajfel等人認為同一團體的成員會彼此偏袒 (in-group favoritism)，對團體之外的成員則具有敵意或偏差 (outgroup hostility) (Tajfel 1981; Miller et al. 1981; Rhea 1997)。於是，把認同對象從種族、社會團體或人民轉換到各政黨，便形成負面黨性研究的重點。Abramowitz與Webster認為「過去40年來，美國政治上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就是負面黨性的興起」 (Abramowitz and Webster 2018, 119)。Abramowitz與Webster運用負面黨性，試圖分析美國當前政治的分裂情形，藉此解釋近年來美國選民為何在投票上越來越展現出對政黨的高度忠誠 (loyalty) — 即使美國選民對於其所屬政黨的認同不變甚至降低。研究發現，對於敵對政黨的負面觀感確實會影響對自己政黨的忠誠，甚至比傳統上的政黨認同更為顯著。他們因此提出了「負面黨性理論」 (theory of negative partisanship)：「對於敵對政黨的強烈負面情感，將會強化選民對於所屬政黨的忠誠」 (Abramowitz and Webster 2016, 15-16)。另外，Garzia與Silva (2021)則分析最近兩次美國總統大選，認為「負面投票」 (negative voting) 已經成為決定美國總統選舉的關鍵。不少學者開始擔憂日益高漲的負面黨性，可能會撕裂美國社會、甚至對目前的民主政治造成威脅 (Bermeo 2018; Fuchs and Klingemann 2019; Iyengar et al. 2019; Mason and Wronski 2018; McCoy and Somer 2018; Svobik 2019; Tuholski 2018)。

Iyengar等(2019)認為，在傳統的政策議題之外，近幾年美國社會已經產生一個新形態的社會分歧：美國民眾越來越討厭、越不信任那些和他們屬於不同政黨的民眾。「情感而非意識型態」，已經成為解釋當前美國政治極化現象的另一種研究途徑。舉例來說，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兩方都說對方自私、虛偽、思想封閉，而且雙方都不願意進行跨黨派的交流。簡言之，即所謂「黨同伐異」，愈來愈偏愛自己所屬陣營的成員，同時愈來愈討厭敵對黨派 (Iyengar et al. 2019)。Levitsky與Ziblatt (2018)兩人也認為，美國當前的極化現象以政黨傾

向為界線，切分出兩個壁壘分明的隔絕世界，彼此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和傳統政策議題上都大相逕庭、缺乏共識。Hetherington與Weiler (2018)則以「共和黨來自火星，民主黨來自金星」(“Republicans are from Mars, Democrats are from Venus”)來指稱當前美國政治的極化現象，甚至社會整體的政治氣氛已經惡劣到雙方成員認為支持敵對黨派就像是叛國一樣。

近來，越來越多實證資料證實上述學者的看法。Iyengar與Krupenkin (2018)透過美國國家選舉調查(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urvey, ANES)長期資料，發現美國不同黨派人士不僅彼此間持負面的態度，而且這種負面情緒逐年增加，形成一個高度分裂的社會。隔年，Iyengar等人根據「情感溫度計」(feeling thermometer)指標，系統性的整理美國情感極化的變化趨勢：美國兩黨間對於自己所屬政黨和對方政黨之間的評價差距明顯擴大，從1980年代的22.64分上升到2016年的40.87分，同時兩黨民衆在日常生活中也「越來越不願與對方政黨為伍」(Iyengar et al. 2019, 131-132)。兩黨民衆間情感認知的擴大，也反應在對於政治人物的評價上，在美國民調與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的報告中，有84%的共和黨民衆滿意川普總統上任以來的表現；然而，只有8%的民主黨民衆表示支持川普。此外，這種對立與隔閡也由政治場域擴大到生活場域，根據調查，73%的兩黨民衆認為自己與另一政黨的支持者連「基本事實」(basic facts)都無法達成共識(Pew Research 2017)。負面黨性不僅僅出現在美國，Gidron、Adams與Horne (2019)使用「選舉體系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s, CSES)資料進行跨國比較，發現澳洲、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民主國家也出現相當程度的情感極化現象，國家內部不同政黨的支持者，彼此互相不滿與仇視。

與此同時，研究發現這些民主國家中，民衆對所屬政黨的認同大致維持穩定，情感極化的擴大主要源自對敵對政黨反感程度的上升(Abramowitz and Webster 2016; Abramowitz and Webster 2018; Iyengar and Krupenkin 2018; Iyengar et al. 2019)。美國國家選舉調查(ANES)的資料顯示，對於自己所屬政黨的情感溫度(feeling-thermometer)，自1980年來長期皆在70分徘徊，直至2016年

美國總統大選才下降到60分左右。<sup>6</sup> 但是，對敵對政黨的評價卻從1980、90年代的45分左右，急遽跌落至近年的30分以下，特別在2016年選舉，美國選民給予對方政黨的評價甚至僅有20分。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6年的調查報告中，發現高達八成五以上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表示「討厭對方政黨」，而回答「非常討厭」的比例也從1984年的21%和17%，上升到58%和55% (Pew Research 2016)。總結來說，美國近年來情感極化差距(affective polarization gap)達到新高的關鍵，便是美國民衆對於敵對政黨負面觀感的急遽上升(Abramowitz and Webster 2018)。

這種負面觀感的升高不僅僅是體現在「政黨」、同時也體現在「候選人」上—美國選民更加討厭那些代表敵對政黨的候選人。舉例來說，在1992年總統大選以前，美國民衆對於對方政黨的總統候選人情感溫度普遍仍有40分以上，不過，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平均只給予對方總統候選人11分的情感分數，是有史以來最低(Abramowitz and Webster 2016; Abramowitz and Webster 2018)。學者也發現，在2012年美國大選期間，給敵方政黨負面評價的選民中，有90%投票給自己所屬的政黨；同時，將對方候選人評為零分的選民，投給自己政黨的可能性高達99.9%(Abramowitz and Webster 2016; Abramowitz and Webster 2018)。隨著情感極化程度的擴大，Abramowitz與McCoy (2019)認為川普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代表社會極化(polarization)與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力量：用民粹主義的言詞與手段吸引群眾，同時巧妙運用美國社會以及選民間的既有分歧訴諸負面情緒，最終獲得勝選；當然，也撕裂了美國社會。上述國外研究顯示，負面黨性—或者說選民對於對方政黨的負面情緒—確實已經對於選舉乃至於社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臺灣學界對負面黨性的研究，目前仍處於低度發展的階段。蕭怡靖（2014）引用社會認同理論觀點，運用情感溫度計指標檢視當前臺灣情感極化的趨勢：臺灣民衆對兩黨或總統候選人的情感偏好呈現對立態勢，越喜歡某一政黨（或候選人）的同時，對於另一政黨（或其候選人）的分數越低，在統計的相關係數上呈現負相關。接著，蕭怡靖（2019）再利用社會認同理論的

<sup>6</sup> ANES情感溫度計量表為0-100分，0表示對該政黨最不喜歡；100表示最喜歡。

「社交距離量表」(social distance scale)，檢視民衆心中對於敵對政黨心理抗拒程度。他發現多數的國民黨和民進黨人，會對其家人「支持」或「加入」敵對政黨感到不滿與失望，證明存在情感上的黨性極化。但是，討厭某一個政黨，就一定會喜歡另一個政黨嗎？兩者未必具有高度相關，特別是有第三黨存在的時候。其次，蕭怡靖並沒對情感極化的測量方法作嚴格檢證。隨後在2020年，蕭怡靖和俞振華兩人以電話調查方法，以受訪者對國民黨和民進黨討厭(antipathy)的程度(1到10分)，以及受訪者認為國民黨與民進黨對國家威脅的程度(1到10分)，兩個指標加總起來的平均數作為情感極化分數(affective polarization score)，但他們沒有提出理論依據，以及對測量指標作深度檢定與分析(Hsiao and Yu 2020)。

莊淑媚與洪永泰提出一個近似負面黨性的概念，也就是對「特定政黨的不認同」。他們從臺灣「含淚投票」的現象出發，發現臺灣部分選民即使對某黨表現失望，但由於更厭惡另一個政黨，最終仍會含淚將選票投給某黨。也就是說，「選民有可能會因為對特定政黨的不認同感，而選擇投票支持其他政黨」（莊淑媚與洪永泰 2011, 3）。在實證調查中，兩人設計了由14個子題所構成的「特定政黨不認同態度題組」，並詢問「有沒有哪個政黨是您絕對不會投票給他的」，以此判斷選民是否有特定政黨不認同的情況。研究發現大約46%的臺灣民衆表示他有「絕對不會投票支持的政黨」，其中，「絕對不會投票支持民進黨」的比率稍稍高於「絕對不會投票支持國民黨」（莊淑媚與洪永泰 2011, 14）。從「含淚投票」的角度切入，可以發現在臺灣藍綠對抗的政治情境下，民衆在選舉時支持特定政黨，「很可能只是因為厭惡其他特定政黨的外顯反應而已」（包正豪 2013, 62）。

上述國內幾篇相關研究，部分觸及負面黨性的內涵，但無論在概念界定、測量方法與理論視角仍未全面，更沒有回應國際相關理論發展的趨勢。其次，上述研究中多半使用單次的橫斷面分析，較缺乏跨時比較的觀察。

## 參、研究假設

很久以前，若干投票行為研究就發現，選民對候選人施政表現（特別是經濟）的不滿意，會產生「反候選人投票」(anti-candidate voting)現象，或稱為「負面投票」(negative voting)(Sigelman and Gant 1989)。從候選人轉移到政黨，選民若不滿某政黨的表現，同樣會產生「反某政黨傾向」，這就是「負面黨性」研究的核心問題。選民絕不是公正無私地評斷所有政黨與候選人，而是對自己所認同政黨的候選人出現偏袒，對其他政黨的候選人不斷貶抑(Weber 2021)。因此，以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為例，負面黨性確實使某些選民忽略川普的種種荒謬的疑論與行徑，只因為「討厭民主黨」、「討厭希拉蕊」而將選票投給他(Abramowitz and McCoy 2019)。

根據加拿大學者Medeiros與Noël的研究，近來在許多民主國家的全國大選中，「負面黨性」已開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以法國為例，極右派的法國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今已改稱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之所以能在近次選舉中嶄露頭角，並非法國人民多喜歡其政黨領袖勒龐(Marine Le Pen)，而是大家更討厭當時的建制派。「負面(認同)才是驅動這些民衆投票的原因」(Medeiros and Noël 2014, 1023)。學者因此認為，「投票給某一政黨的決定不僅取決於一個人長期對該政黨的認同，還取決於對其他敵對政黨是否有著強烈的負面看法」(Medeiros and Noël 2014, 1035)。

也就是說，當選民對某一特定政黨有負面黨性時，很可能會以選票來「懲罰」該政黨；同時，在投票選擇上，負面黨性雖然可能不像傳統政黨認同一樣，足以直接決定選民投票的對象，但它卻可以幫助選民縮小選項、或是強化既有的選擇。德國學者Mayer分析歐洲17個多黨制國家，發現負面黨性確實影響歐洲民衆的投票行為：當選民對其它政黨擁有負面黨性時，對於自己政黨就會更加忠誠。Mayer認為，「不管是兩黨制或多黨制的證據皆表明，對其他政黨的敵意，確實對選民的投票行為有獨特的影響力」(Mayer 2017, 1)。Mayer也試圖釐清政黨認同和負面黨性之間的關係，認為選民很可能「只會有一個政黨認同，卻可能有數個負面黨性」(Mayer 2017, 3)。

基於上述相關文獻的討論，以及對臺灣社會的觀察，本文提出兩個具有理論意義的研究假設：

假設一：在控制其他變數下（尤其是政黨認同），對國民黨越具有負面黨性（評價）的人，在總統選舉時越可能投給民進黨的候選人。

假設二：在控制其他變數下（尤其是政黨認同），對民進黨越具有負面黨性（評價）的人，在總統選舉時越可能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

本文希望透過政大選舉研究中心黃紀等人主持的「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計畫資料，全面檢視臺灣負面黨性的發展趨勢（黃秀端 2004；游清鑫 2008；朱雲漢 2012；黃紀 2016；2020）。<sup>7</sup>

## 肆、測量方法

負面黨性應該如何測量？根據李弘繹與張佑宗（2020）整理，目前學界主要有兩種測量方式。其一是Abramowitz與Webster（2018）將民衆對於敵對政黨的「負面情緒」(negative feeling)，與對所屬政黨的「正面情緒」(positive feeling)相比較，具體化爲以下的分數：

$$(100 - F.T. \text{ rating of opposing party}) - F.T. \text{ rating of own party}.$$

該分數最終可得出一個-100至100的數值，若此數值小於0，則代表民衆相較於討厭對方政黨，更偏愛他們自己的政黨；反之，若數值大於0，則代表對

<sup>7</sup> 本文使用的資料全部係採自「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2004至2020年台灣五次總統選舉結束後所執行之面對面民意調查訪問資料。2004年計畫主持人爲黃秀端教授；2008年計畫主持人爲游清鑫教授；2012年計畫主持人爲朱雲漢教授；2016和2020年之計畫主持人爲黃紀教授。「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多年期計畫總召集人爲國立政治大學黃紀教授；詳細資料請參閱TEDS網頁：<http://teds.nccu.edu.tw>。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於敵對政黨的厭惡大於對自己政黨的偏愛。根據上述測量方式，作者將數值大於0的民衆歸類為具有負面黨性、小於0的民衆歸類具有正面黨性。然而，此測量方式卻有兩個嚴重缺陷：一、該測量方法是由兩種情緒分數進行相減，並將相減後的數值進行歸類，忽視了數值背後具有不同的意義。<sup>8</sup>二、該方式僅能測量具有政黨認同的民衆，無法涵蓋到無政黨認同的中立選民。由此可見，Abramowitz與Webster的測量方式在特定情境下，雖能有效解釋美國兩黨選民的投票動機與政治現象，卻缺乏足夠的理論依據支持，同時在測量效度上亦有所缺陷。

另一種測量方式是由Caruana、McGregor與Stephenson (2015)及Mayer (2017)所提出，他們結合Medeiros與Noël (2014)的研究，使用兩個標準作為來判斷負面黨性：一、在情感溫度計給予該政黨低於50分的評價（表示選民對該政黨有負面情緒）。二、選民有回答「絕對不會投票給它」（該政黨）。當滿足以上兩個條件，即可認定該選民具有對該政黨的「負面黨性」。如同作者的闡述：選民回答「絕對不會投票給它」代表對於該政黨的不支持，但不支持特定政黨有許多原因，不一定全然是厭惡的緣故。因此，同時採取這兩個條件來判別負面黨性，更能捕捉到負面黨性的真實樣貌(Caruana, McGregor, and Stephenson 2015, 777-778)。

本文認同Caruana、McGregor與Stephenson (2015)及Mayer (2017)的測量概念。首先，該測量方式在理論架構上更有說服力；此外，以臺灣選民結構來說，我們不能忽略佔有相當比例的中間選民的作用(Wang 2019)，此測量方法將有助於本文對於台灣整體的負面黨性情況進行評估。遺憾的是，在TEDS歷屆資料（或是當前臺灣其他調查資料）中並沒有「是否有你絕對不會投票給他的政黨？」此一題目。因此，本文退而求其次，以情感溫度計中「給予該政黨2分以下（含）」作為選民是否具有對於該政黨負面黨性的判斷標準。此標準建立有以下三個依據：首先，根據國外文獻的預測模型，當選民對於對方政黨

---

<sup>8</sup> 舉例來說，在Abramowitz與Webster (2018)的定義中，給予敵對政黨0分、自己政黨99分的A受訪者，與給予敵對政黨50分、自己政黨49分的B受訪者，在計算後都同樣是1分，屬於負面黨性選民，但事實上A、B兩受訪者對於敵對政黨的態度卻是截然不同，一個極度厭惡（0分）、另一個則是保持中立（50分），證實了此種分類方式確實存在缺陷。

候選人情感溫度為50（中立）時，忠誠投票的機率為0.796，而當情感溫度為20分以下時，模型顯示他「幾乎不會投票給那個政黨」（Abramowitz and Webster 2018, 132-133），本文認為此分數（於臺灣情感溫度計中等同於2分）可做為參考的基礎。其次，根據張佑宗主持的「臺灣社群媒體中的假新聞、同溫層與極化現象」計畫，在2020年底進行一項網路調查實驗的結果，顯示當民眾給予某政黨2分以下時，才和「絕對不會投票給它（該政黨）」出現正相關，給予1分和0分時關係更加顯著（ $p < 0.001$ ）；而當民眾給予該政黨3分或以上時，則和「絕對不會投票給該政黨」呈負相關（張佑宗 2020）。<sup>9</sup>最後，根據TEDS 2012年全國性調查的結果，以2分以下作為負面黨性界定標準所得之具有負面黨性的選民比例顯示，有9.6%的受訪者具有對國民黨負面黨性、12.9%的受訪者具有對民進黨負面黨性，上述結果與莊淑媚與洪永泰（2011）全國性調查所得的負面黨性比例（8.1%的受訪者表示絕對不會投票給國民黨、11.6%的受訪者表示絕對不會投票給民進黨）十分相近。本文認為以情感溫度計中「給予該政黨2分以下（含）」，作為選民是否具有對於該政黨負面黨性的判斷標準，是有以上理論和實證上的依據，不是基於作者主觀的判別。<sup>10</sup>

## 伍、描述分析

台灣民眾對國民黨和民進黨具有負面黨性的比率如何？圖1是2004年至2020年期間具有負面黨性者佔全體受訪者的比例變化。<sup>11</sup> 首先從總體來看，可

<sup>9</sup> 「臺灣社群媒體中的假新聞、同溫層與極化現象」計畫，線上調查的執行時間為2020.11.20至2020.11.25，期間蒐集了來自全台各縣市共2076個受訪者的資料。受訪者的男女比例為43%與57%，年齡平均為36.9歲。給予民進黨之情感分數（0至5分）與「絕對不會投票給民進黨」之Pearson相關性（雙尾）分別為：.161（ $p < 0.001$ ）、.189（ $p < 0.001$ ）、.035、-.020、.004、-.128（ $p < 0.01$ ）。給予國民黨之情感分數（0至5分）與「絕對不會投票給國民黨」之Pearson相關性（雙尾）分別為：.380（ $p < 0.001$ ）、.205（ $p < 0.001$ ）、-.002、-.075（ $p < 0.001$ ）、-.091（ $p < 0.001$ ）、-.170（ $p < 0.001$ ）。更多資訊請參閱計畫網站：<https://websurvey.coss.ntu.edu.tw/>。

<sup>10</sup> 相關變數詳細的編碼（操作）方式，請參見附錄一。

<sup>11</sup> 圖中「總計」為「具有對國民黨負面黨性」加上「具有對民進黨負面黨性」之選民比例。在歷屆資料中，約莫有1~3%的選民對於兩主要政黨的情感分數皆低於兩分，根據Caruana、McGregor與Stephenson (2015)及Mayer (2017)，對於主要政黨皆具有負面黨性

以發現2004-2008年陳水扁政府執政後半段，臺灣負面黨性選民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在馬英九總統上台之後，負面黨性選民比例下降至2012年的22.5%，同時也是近五屆最低。然而，從馬英九執政後期開始，負面黨性在台灣呈現明顯擴張趨勢，具有兩黨（國民黨、民進黨）負面黨性的臺灣民眾比例從2012年的22.5%大幅增加至2020年的33.2%。從政黨層面來說，在2012年之後，相較於討厭民進黨，有更高比例的民眾更討厭國民黨。若根據負面黨性的定義，他們即是「絕對不願意投給國民黨」的一群人，這不僅可能是國民黨在2016與2020年總統選舉失敗的關鍵因素，對於國民黨未來的發展，也無疑是個重大警訊。不過，對於民進黨而言，2016年後對其不認同的選民比例也有反彈向上的趨勢，反映「討厭民進黨」也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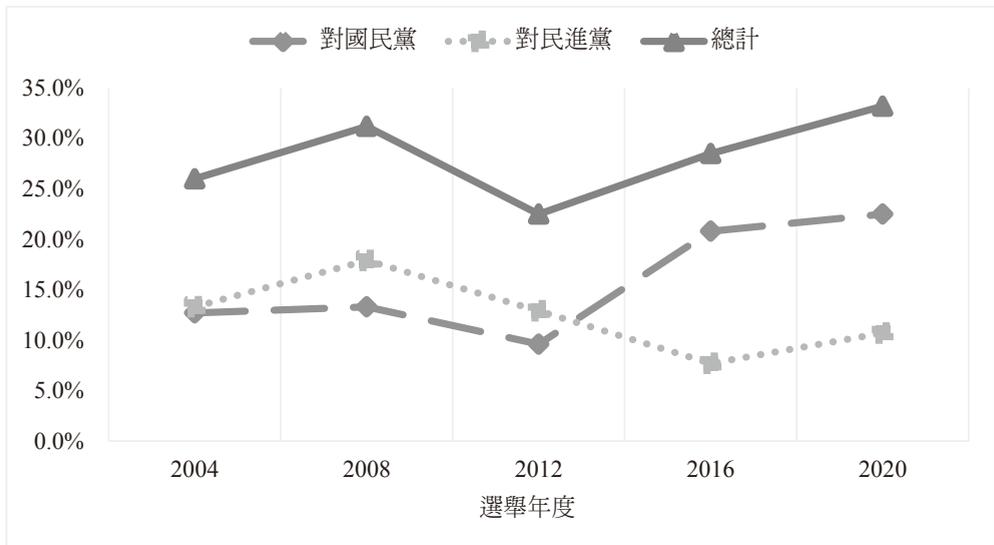


圖1 負面黨性選民百分比的變化：2004-2020年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朱雲漢（2012）、黃紀（2016；2020）。

另外，本文也觀察到負面黨性的相對高低和選舉結果高度關聯，除了2004

的選民屬於所謂的「普遍政治厭惡」(general anti-politician sentiment)，與對於「特定政黨」(single political party)不支持的負面黨性不同。因此，本文將其排除於計算之外。

年的總統選舉異常接近之外，在此後的總統大選中，負面黨性比例較高的政黨都無法在該屆選舉中獲勝。

負面黨性選民比例的變化也是觀察近來臺灣情感極化現象的指標。情感溫度計屬於「自我報告」(survey self-reports)的一種，透過問卷調查以求得受訪者的自我意見與情感反應，被認為是測量情感極化最普遍的一種方式(Iyengar et al. 2019, 131)。在TEDS關於情感溫度計的題組中，會詢問國民黨支持者與民進黨支持者對於自己政黨與對方政黨的情感溫度評價，此評價分數由最低的0分至最高的10分，形成一個11分的連續變數，愈高表示「越喜歡這個政黨」，愈低表示「越討厭這個政黨」。圖2顯示臺灣2004至今，臺灣兩黨選民對於政黨的情感溫度變化。

根據圖2結果，可以觀察到選民對於所屬政黨的情感分數長期維持在7分上下，而對於敵對政黨的態度則有較明顯的起伏變化：在2012年時，兩黨民眾對於對方政黨的評價來到了最溫和的3.54分，在此之後，兩黨支持者對彼此政黨的態度急轉直下，2016年僅剩3.1分，到了2020年甚至只願意給予對方政黨2.78分，是有史以來的最低分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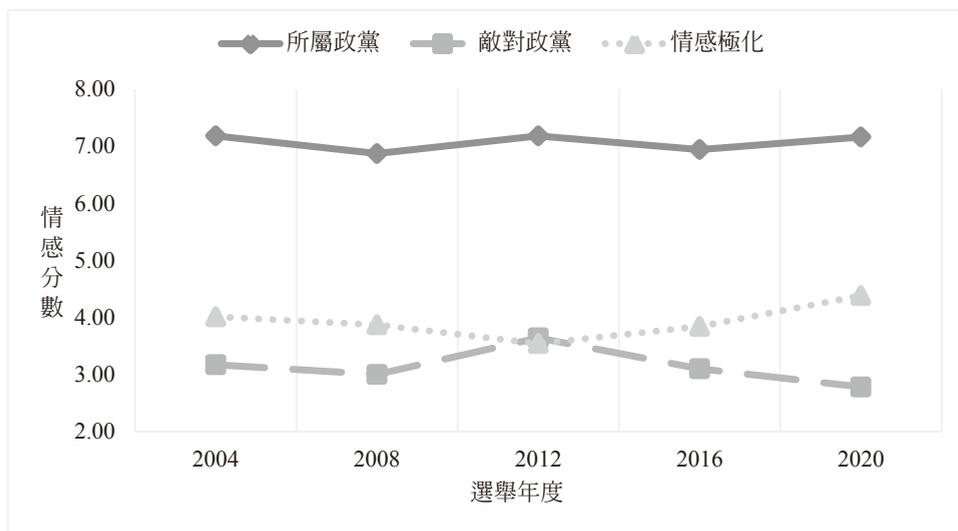


圖2 政黨情感溫度計平均數的變化：2004-2020年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朱雲漢（2012）、黃紀（2016；2020）。

這種發展趨勢與美國相近，也反映在情感極化程度的變化上。圖表中所屬政黨和敵對政黨兩曲線之間的差距，即是所謂的情感極化，透過圖表可以觀察出2004至2020年間臺灣情感極化的變化趨勢。情感極化程度越大，代表兩黨支持者間情感認知的差異越大；在現實中，則反映了政黨之間的鴻溝加劇(Iyengar et al. 2019)。臺灣的情感極化雖在2004至2012年呈現較為平緩的趨勢，然而在2012年以後，隨著民眾對於敵對政黨的態度越趨負面，臺灣的情感極化程度明顯上升，並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達到有史以來最高的4.38分，一舉超過了陳水扁時期的情感極化程度（4.01分）。而臺灣情感極化的發展趨勢，與臺灣負面黨性選民比例的變化，亦高度相合。

綜合2004-2020年的資料，本文發現2012年總統大選是一個轉折點：從2008到2012年這段時期，臺灣黨性對立的情形事實上是呈現緩和的，不僅民眾對於對方政黨的情感分數稍有上升，負面黨性選民的比例亦為歷年最低；然而，在2012年以後，臺灣兩黨民眾對於彼此的態度開始急轉直下，到了2016年朱立倫（國民黨提名）與蔡英文（民進黨提名）競選時，兩黨支持者對彼此政黨的評價已遠低於4年前的水準，具有負面黨性的比例亦急遽上升（尤其對於國民黨的負面黨性）。這種極化的趨勢一直持續到2020年總統大選，兩黨民眾對於對方政黨的情感分數皆是有史以來最低，而具有負面黨性的選民比例則來到歷年最高。一個事實擺在眼前：自2012年以後，臺灣兩黨支持者對於彼此的負面情緒加劇－國民黨和民進黨支持者越來越討厭對方政黨、以及政黨候選人；除此之外，2012年後的情感極化程度也顯著升高，甚至超越了陳水扁時期、來到歷史新高，這也反映了當前藍綠之間劍拔弩張、有如兩個政治部族對立的社會氛圍。

如何解釋2012年之後，臺灣社會負面黨性的比率突然陡升？學術界對負面黨性或情感極化的成因，大致從四個角度切入。第一，有些人強調全球經濟結構的轉變，造成分配不均導致極化問題，如朱雲漢（2020）、Abramowitz與McCoy (2019)等人；第二，有人強調文化或價值衝突，包括物質主義/後物質主義，移民/反移民，同婚/反同婚，如Abramowitz與Webster (2016)，Hetherington與Weiler (2018)亦有類似主張。第三，有一派學者強調當今「具有黨派色彩的社群媒體的崛起」，認為網路和社群媒體加劇了政治上的分裂，如

Abramowitz與Webster (2018)、Druckman、Levendusky與McLain (2018)，和Martin與Yurukoglu (2017)。最後，Bassan-Nygate與Weiss (2022)強調政黨競爭與合作，對情感極化與負面黨性的影響。至於臺灣有關負面黨性產生原因及其發展，目前還沒有人作深入的研究。我們認為與2012年之後「中國崛起」（地緣政治）、「害怕被統一」、「太陽花運動」，或是「軍公教福利改革」、「韓流」，以及社群媒體與同溫層等因素有關。上述這些看法，仍有待日後的檢證。

針對臺灣負面黨性選民的組成，本文也做了進一步的分析。圖3顯示了兩黨民衆對於對方政黨具有負面黨性比例的變化。圖表中年度數值越高，代表當時有越高比例的支持者厭惡、不認同對方政黨，同時也表示選民組成更加極端。根據圖3可以發現，在2012年時，兩黨支持者中大約只有四分之一的民衆對於敵對政黨具有負面黨性，然而，在此之後雙方支持者的仇視加劇，尤其明顯反映在民進黨支持者對於國民黨的厭惡迅速升高，到了2020年的總統大選，國、民兩黨陣營已分別有39.6%、45.1%的支持者對於對方政黨抱有極端厭惡的態度，超越了2004-2008年間的負面黨性比例。簡而言之，在最近一次的總統大選（2020）中，基本上有4成以上的兩黨選民已成爲對方政黨的堅定反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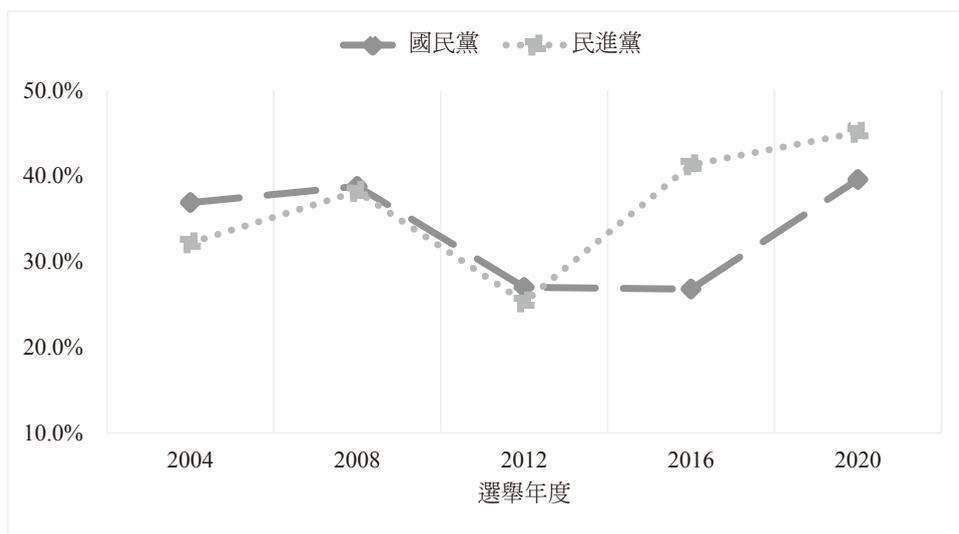


圖3 「國民黨支持者」及「民進黨支持者」負面黨性比例變化：2004-2020年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朱雲漢（2012）、黃紀（2016；2020）。

考量到臺灣的政治環境，除了兩黨民衆外，本文也特別關注中立選民（中立無所屬）的負面黨性變化情況。根據圖4，本文發現中立選民在政黨態度上相較於兩黨民衆溫和許多，具有負面黨性的比例僅介於9%-15%之間；然而，本文觀察到即使是中立選民，負面黨性在2012年後也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其中「對國民黨具有負面黨性」的比例高於「對民進黨具有負面黨性」，也代表相較於對民進黨而言，有更高比例的中立選民不認同國民黨。總結來說，本文認為2012年後中立選民負面黨性比例的上升值得關注，因為對於不具有政黨認同的中立選民而言，是否具有對某黨的負面黨性可能就是其決定投給另一政黨的關鍵，「在爛蘋果裡挑一個比較不爛的」。<sup>12</sup> 2016和2020年中立選民對於國民黨較高的負面黨性，似乎也反映了這個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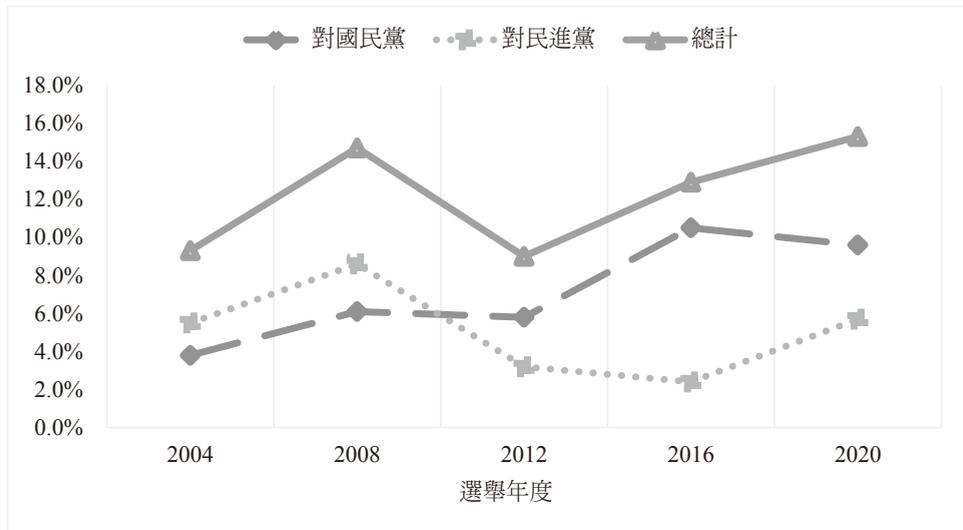


圖4 中立選民具負面黨性比例的變化：2004-2020年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朱雲漢（2012）、黃紀（2016；2020）。

<sup>12</sup> 負面黨性在臺灣越來越嚴重，張佑宗於2021年使用Caruana, McGregor與Stephenson (2015)的測量方式，結果顯示臺灣社會中立選民有23.4%的人表示厭惡國民黨，有23.8%的人表示厭惡民進黨，也有10.2%的人厭惡臺灣民眾黨。中立選民沒有特定的政黨偏好，卻高達一半以上的人明白表示討厭某政黨。相關報導可見於：張佑宗、李佩軒與林懿平，2021，〈仇恨漸漸主宰臺灣未來的政黨競爭〉，新新聞，10月18日，<https://new7.storm.mg/article/3994169>，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8日。

為進一步驗證負面黨性的效力與獨立性，本文以「相關分析」(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的統計方式，來評估民衆對於兩黨情感分數之間的關係。藉由相關分析的數值與變化，可以評估選民對兩黨情感極化的程度，也可以檢視具有某一黨負面黨性的選民，是否就一定越偏好另一政黨。

圖5顯示了民衆對國、民兩黨情感分數之相關係數變化，可以發現兩者確實呈現負相關 (p值均 $< 0.01$ )；然而，本文也發現2004-2020年間，相關係數的數值雖然在歷屆選舉中有所變化，例如在2004年開始呈現較明顯的對立趨勢，在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再度升高，但是相關係數大致介於-0.3至-0.45之間，在統計上基本屬於所謂的「低度相關」(modestly correlated)到「中度相關」(moderately correlated)，尤其在2012年後其相關係數絕對值皆低於0.4。<sup>13</sup>這說明選民偏好某個政黨的同時，也較有可能討厭另一政黨，但並非一對一的高度負相關。根據Portmann與Stojanovic (2022)兩人對瑞士選民的研究，in-group favoritism與outgroup hostility這兩個是不同的面向，它們各自可以獨立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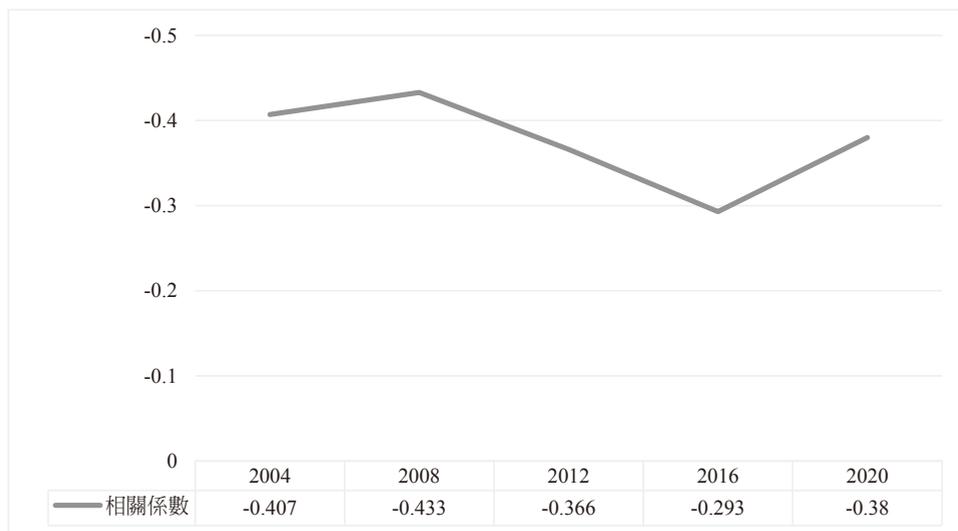


圖5 政黨情感溫度計相關係數的變化：2004-2020年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朱雲漢（2012）、黃紀（2016；2020）。

<sup>13</sup> 本文參考Cohen(1992)針對皮爾森相關係數提出的標準：0.1~0.3（或-0.1~-0.3）為低度相關，0.3~0.5（或-0.3~-0.5）為中度相關，0.5~1.0（或-0.5~-1.0）為高度相關。

在的。也就是說，負面黨性的民衆有可能單方面討厭特定政黨，對其他政黨（或候選人）沒有任何正面評價。<sup>14</sup>

綜合2004-2020年的資料，即使是具有對方政黨負面黨性的兩黨支持者，對於自己政黨的平均喜好程度（情感分數）也只比歷年平均值（7.1）多了0.5分。也就是說，正如學者所提出，我們無法單純從正向評價(positive evaluation)或正向政黨認同(positive party identification)來推斷另一面的結果，而是必須獨立看待負面黨性單獨的存在(Medeiros and Noël 2014)。

根據2004-2020年五波資料，我們發現負面黨性的選民在臺灣已經佔有一定比例，隨著當時的社會氛圍與政治環境有所波動，而在2012年後，不管是兩黨支持者或中立選民，負面黨性的比例都逐漸攀升，並於2020年總統大選時達到高峰。負面黨性的現象在臺灣，已不只是一個概念，而是已經有了相當厚實的社會基礎。

## 陸、模型分析

首先，本文先比較政黨認同、負面黨性與國家認同這三個自變數，在解釋選民的投票行爲（總統選舉）上，哪一個因素最重要？其次，次要因素又是哪一個？爲達到這個目的，本文使用「正規化回歸」(regularized regression)的分析方法。正規化回歸的目的在有大量自變數時，通過檢測加入某特定變數，對減少模型平方誤差總和(Sum of Squared Error, SSE)的貢獻，以決定針對該變數是否進行「懲罰」(penalty)，亦即將其係數縮小到零，而最後一個係數達到0的變數就是最重要的(Zou and Hastie 2005)。在實際操作上，Becker、Fetzer與Novy (2017)採用貝氏信息量準則(Bay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來探索脫歐公投與英國國會選舉投給各黨的選民特徵，BIC通過逐步迴歸(stepwise regression)的方法，這種方法依照自變數順序，一一加入模型來測試總體預測能力是否上升。Levi and Patriarca (2020)使用LASSO迴歸分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此方法的過程是同時針對所有變數，並不需

<sup>14</sup> 瑞士的投票制度相當特別，選民可以選擇把票投給喜歡的政黨(positive preference votes)，也可以投不喜歡的政黨(negative preference votes)。

要像逐步迴歸一樣按照順序。然而，LASSO對估計參數是採取絕對值的方式計算，其絕對值計算會把一群彼此相關的變數強迫篩選，僅剩下最後一個最具貢獻的變數，在變數彼此之間異質性較小的狀況時，可能產生過度篩選的問題。故本文最後決定使用Zou and Hastie (2005)提出的「彈性網絡」(elastic net)來進行變數的比較，假設預測變數和依變數有線性關係。

圖6和圖7是經過正規化回歸分析的結果。2004年對國民黨之負面黨性，其預測選民投給民進黨的能力不如支持獨立，但對投給國民黨的預測能力上，對民進黨之負面黨性較支持統一來的強大。2008年時無論是模型一或模型二，負面黨性的預測能力都超越了支持統一的因素，但不如支持獨立的強。到2012年，模型一中對國民黨的負面黨性，首次超越了統獨的意識形態，成為僅次政黨認同最具有預測能力的變項；在模型二部分，對民進黨的負面黨性則和2008年同樣、超越對支持統一的變數。2016年時負面黨性和支持獨立的意識形態，對於選民投票選擇的預測能力已不相上下，並大幅超越了支持統一的意識形態。在2020年時，在預測投票給民進黨的結果上，對國民黨的負面黨性仍未超越支持獨立的立場；然而，在預測投票給國民黨方面，對民進黨的負面黨性則超越統獨意識形態，成為僅次於政黨認同的變項。

根據正規化迴歸的結果，佐證政黨認同仍然是預測投票選擇的最重要因素，但負面黨性至少與傳統著重的統獨變項並駕齊驅，成為影響選民投票選擇的三大關鍵因素之一。

其次，本文再加入其他控制變數，測試負面黨性對總統選舉選民的投票抉擇，是否仍有解釋力？本文採用二元羅吉斯迴歸(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對於2004至2020年五屆總統大選進行統計分析，試圖進一步分析負面黨性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選擇，並設置兩個模型加以檢視之，顯示於表1和表2。其中，表1模型（模型一）的依變數為是否投給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表2模型（模型二）為是否投給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sup>15</sup> 在控制變數部分，過去研究證實政黨

<sup>15</sup> 本文必須拆為兩個模型進行分析，因為模型中的自變數（對國、民兩黨的負面黨性）不能同時放入在同一個模型中，因存有個案數太少的問題。在2012年至2020年間，對國民黨具有負面黨性，仍投給國民黨的人，分別只有1人、1人與4人。對民進黨具有負面黨性，仍投給民進黨的人，分別只有0人、0人與4人。在個案數極少，甚至出現0個案的情況下，本文計算出來的係數方向合理，但標準差卻大得離譜，這是不恰當的(illegal)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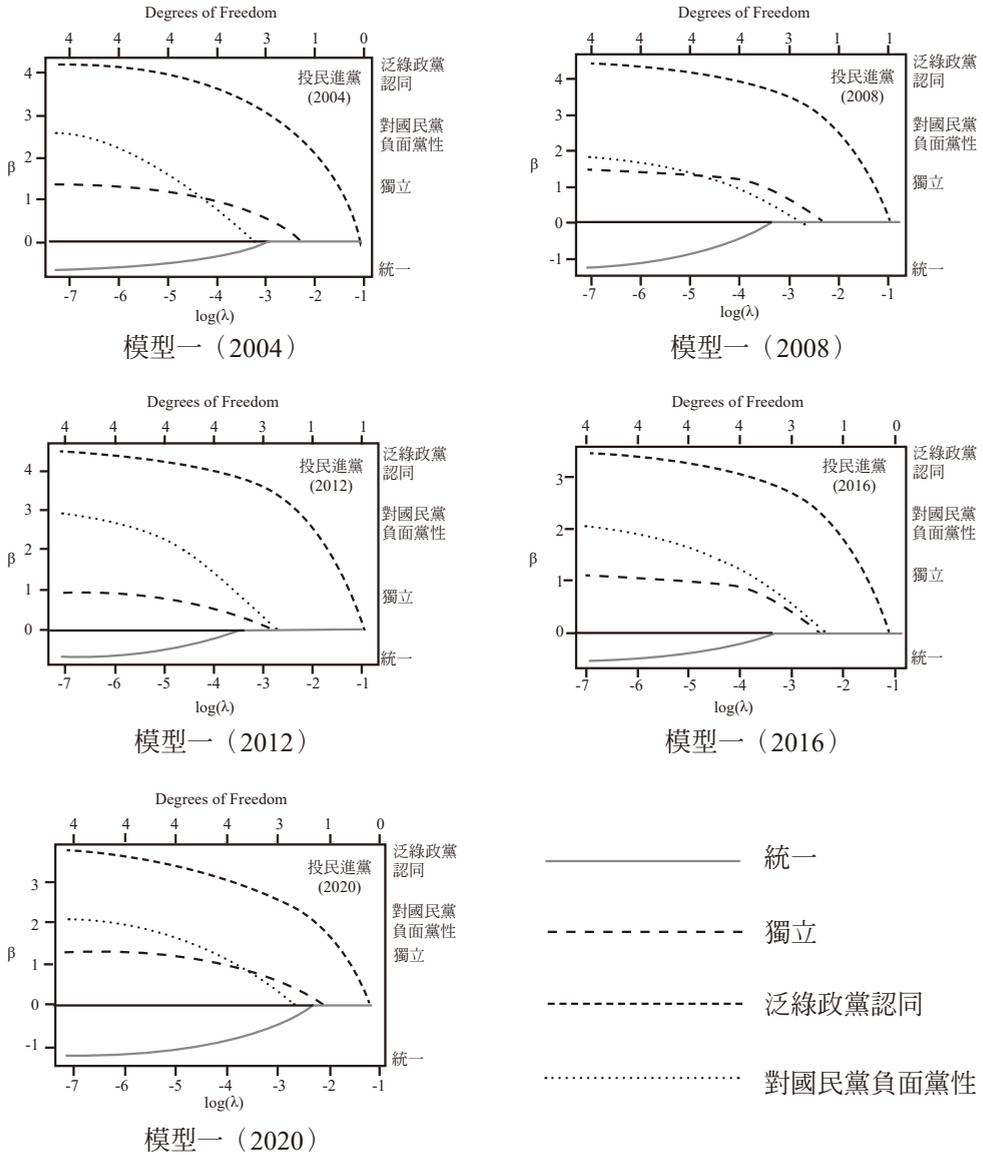


圖6 負面黨性對投票選擇的正規化迴歸結果 (投民進黨 vs. 其他)

資料來源：黃秀端 (2004)、游清鑫 (2008)、朱雲漢 (2012)、黃紀 (2016; 2020)。

析。因此，本文拆開成兩個模型進行分析 (顯示於表1和表2)，一個是檢證對國民黨有負面黨性，是否會投給民進黨；另一個是檢證對民進黨有負面黨性，是否會投給國民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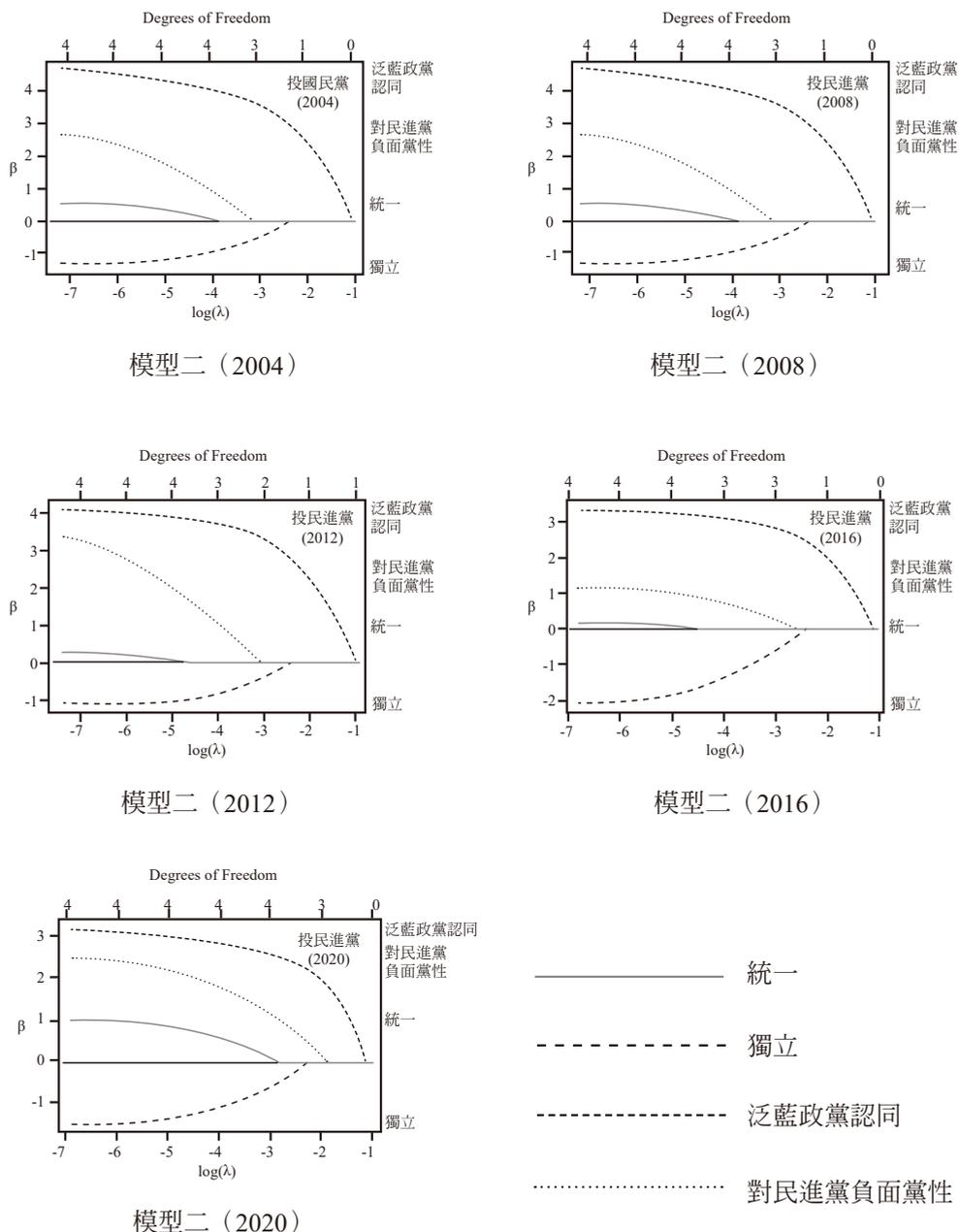


圖7 負面黨性對投票選擇的正規化迴歸結果（投國民黨vs. 其他）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朱雲漢（2012）、黃紀（2016；2020）。

表1 負面黨性對投票選擇的羅吉斯迴歸模型：投民進黨（模型一）

解釋項	模型一（投民進黨）														
	2004			2008			2012			2016			2020		
	β	S.E.	Exp(β)	β	S.E.	Exp(β)	β	S.E.	Exp(β)	β	S.E.	Exp(β)	β	S.E.	Exp(β)
年齡（連續變數）	-0.02	.010	.998	-0.19	.011	.981	.007	.010	1.007	.004	.009	1.004	-0.028**	.009	.973
性別（對照：男性）															
女性	.250	.226	1.284	-0.177	.237	.838	-0.300	.228	.741	-0.145	.218	.865	-0.256	.216	.774
教育程度（連續變數）	-0.445**	.141	.641	-0.323*	.154	.724	.127	.133	1.135	-0.032	.133	.969	-0.549***	.127	.577
政黨認同（對照：中立無所屬）															
泛藍	-3.637***	.308	.026	-2.784***	.390	.062	-3.092***	.324	.045	-3.127***	.287	.044	-2.634***	.256	.072
泛綠	3.019***	.351	20.467	3.345***	.269	28.353	3.037***	.267	20.841	2.110***	.269	8.247	2.904***	.377	18.239
對國民黨負面黨性	2.184*	.876	8.879	1.457***	.404	4.292	2.048**	.604	7.750	1.181**	.391	3.258	1.236**	.450	3.442
省籍（對照：閩南）															
客家	.139	.334	1.149	-0.884*	.374	.413	-0.092	.336	.912	.172	.322	1.187	-0.081	.308	.923
外省	-0.883*	.437	.414	-2.809***	.785	.060	-2.500***	.584	.082	-0.627*	.377	.534	-0.968**	.356	.380
統獨立場（對照：維持現狀）															
統獨立場	-0.171	.303	.843	-1.249**	.481	.287	-0.516	.396	.597	-0.032	.330	.968	-1.028**	.357	.358
獨立	.914**	.290	2.495	1.288***	.271	3.627	.685*	.272	1.984	1.141***	.295	3.131	1.253***	.271	3.500
常數項	1.381	.728	3.978	.578	.817	1.783	-1.119	.812	.327	.249	.780	1.282	3.634***	.764	37.848
模型資訊															
Observations	1229			1282				1283			1101			1154	
-2 Log Likelihood	547.443			510.706				548.176			591.919			582.915	
Nagelkerke	0.811			0.821				0.811			0.740			0.742	
R-Square	10			10				10			10			10	
df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p-value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朱雲漢（2012）、黃紀（2016；2020）。

說明：\* <0.05, \*\* <0.01, \*\*\* <0.001。

認同對於個人的投票選擇具有重大影響(Campbell et al. 1960; Powell 1986)，為準確衡量負面黨性是否具有獨立的作用，本文加入政黨認同因素進入模型。模型中也加入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經社變項，以及統獨立場、省籍等傳統變項作為控制變數進行分析。

根據分析結果顯示，對國民黨具有負面黨性這個因素，從2004到2016年間對投給民進黨都具有顯著的解釋力，為何在2020年出現沒有顯著的影響？原因可能是受到某些外部因素的影響，例如2019年1月3日習近平提出「兩岸一中」的宣示，接著發生香港「反送中事件」，升高臺灣社會的國家意識及危機。再加上臺灣社會出現「討厭韓國瑜」的聲音，這股討厭的力量，未必等同於討厭國民黨。因此，投給蔡英文的因素很多，但不包括討厭國民黨。

至於對民進黨具有負面黨性這個因素，除了在2008年總統選舉時不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其他四屆的解釋力都達到顯著水準，尤其在2020年的總統選舉特別重要。2008年總統大選時民進黨深陷陳水扁國務機要費弊案，民進黨整黨遭受空前的危機，中間選民站出來投票給馬英九及國民黨立委候選人，但他們未必就討厭民進黨，只想要給民進黨一個教訓。因此，投給馬英九的因素很多，但不包括討厭民進黨。另外，我們可從政黨認同這個因素來輔助證明上述看法，2008年認同民進黨而投票給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 $\beta$ 值(odds ratio)，為五屆資料中最高的一次，也就是民進黨在2008年時僅剩下「鐵桿部隊」。

2020年對民進黨負面黨性為何特別顯著？國民黨由韓國瑜代表參選，強烈支持韓國瑜的人（即韓粉）是以退休軍公教為主體，他們強烈反對民進黨提出的年金改革方案，韓流把大量中間選民趕向給蔡英文，但中間選民未必討厭國民黨，如同民進黨在2008年時僅剩「鐵桿部隊」一樣，討厭民進黨成為一個投給韓國瑜相當重要的解釋因素。

在其他解釋項中，政黨認同一直是解釋臺灣社會投票行為最重要的解釋因素，在迴歸結果中也的確呈現這個結果。至於統獨立場，相對於維持現狀而言，偏向臺灣獨立的選民，一直都是民進黨忠實的支持者；偏向統一的選民，只有在2002與2020年才具有重要的解釋力，尤其是在2020年的選舉。如同上述對2020年的解釋，韓國瑜只剩「鐵桿部隊」，在態度上比較偏向支持兩岸統一的選民。

表2 負面黨性對投票選擇的羅吉斯迴歸模型：投國民黨（模型二）

解釋項	模型二（投國民黨）														
	2004			2008			2012			2016			2020		
	β	S.E.	Exp(β)	β	S.E.	Exp(β)	β	S.E.	Exp(β)	β	S.E.	Exp(β)	β	S.E.	Exp(β)
年齡（連續變數）	.000	.010	1.000	.013	.011	1.013	-.004	.010	.996	.019*	.009	1.019	.018*	.030	1.019
性別（對照：男性）															
女性	-.329	.227	.719	.091	.237	1.095	.378	.217	1.459	.031	.215	1.031	.192	.217	1.212
教育程度（連續變數）	.419**	.140	1.521	.251	.155	1.285	-.088	.126	.916	-.055	.132	1.057	.252*	.124	1.286
政黨認同（對照：中 立無所屬）															
泛藍	3.462***	.320	31.888	2.640***	.393	14.014	2.673***	.261	14.481	2.301***	.234	9.987	2.216***	.229	9.173
泛綠	-3.208***	.347	.040	-3.446***	.268	.032	-3.027***	.282	.048	-2.592***	.425	.075	-3.503***	.527	.030
對民進黨負面黨性	1.742**	.624	5.711	2.861**	1.002	17.475	2.740**	1.025	15.486	.979**	.350	2.661	1.956***	.391	7.071
省籍（對照：閩南）															
客家	-.169	.346	.844	.924*	.383	2.520	.220	.317	1.246	-.278	.290	.757	-.041	.303	.960
外省	.691	.459	1.996	2.428**	.733	11.340	1.670**	.484	5.313	.335	.312	1.398	.691*	.343	1.995
統獨立場（對照：維持現狀）															
統一	.264	.310	1.302	1.205*	.494	3.338	.470	.372	1.599	.005	.280	1.005	.799*	.323	2.223
獨立	-.923**	.285	.397	-1.402***	.267	.246	-.617*	.263	.540	-1.607***	.349	.201	-.824**	.277	.439
常數項	-1.313	.724	.269	-.289	.815	.749	.283	.768	1.327	-2.315**	.779	.099	-2.866***	.755	.057
模型資訊															
Observations	1229			1274			1274			1102			1154		
-2 Log Likelihood	543.514			501.376			604.516			599.966			573.014		
Nagelkerke															
R-Square	0.812			0.824			0.791			0.672			0.725		
df	10			10			10			10			10		
p-value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朱雲漢（2012）、黃紀（2016；2020）。

說明：\* <0.05, \*\* <0.01, \*\*\* <0.001。

在模型解釋力上，決定係數(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在於指示迴歸模型的解釋力(explanatory power)，當 $R^2$ (R-Square)的值越趨近於1時，代表自變項越能完整解釋依變項的變異量，也代表模型的解釋力越強。根據圖表可以發現，本文的羅吉斯迴歸模型，不論是模型一或模型二，其調整後的Nagelkerke  $R^2$ (Nagelkerke R-Square)在歷屆資料中只有一屆低於0.7、大多數資料年份甚至達到0.8以上，說明本文模型在統計上確實有相當高的解釋力。

此外，本文分析模型也通過共線性檢驗(collinearity diagnostics)：透過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與條件指標(condition index, CI)兩個指標，檢測各變數是否具有共線性的問題。對此，學界普遍認可的標準是變異數膨脹因子(VIF)低於10、或是條件指標(CI)低於30，而本文迴歸模型中歷年各項指標皆遠小於前述所提的判斷基準，因此足證本文的分析模型並沒有明顯的共線性問題。

總結來說，本文實證結果不僅反映臺灣負面黨性的變化，同時呼應Me-deiros與Noël(2014, 1035)所說：「投票給某一政黨的決定不僅取決於一個人長期以來對該政黨的認同，也取決於他對其他敵對政黨是否有著強烈的負面看法」。當臺灣選民對某政黨具有負面黨性，會傾向把票投給它的敵對政黨。

## 柒、結論

一個社會出現政黨情感極化的問題，將對民主穩定會造成重大的影響。Hetherington和Weiler (2018)在“*Prius or Pickup? How the Answers to Four Simple Questions Explain America's Great Divide*”一書中，闡述了當美國民衆的世界觀，已經與其政黨傾向緊密相關：美國兩大政黨的選民，彼此的好感達到歷史新低，不只在意見上缺乏共識，甚至認為彼此是「國家的威脅」，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車款，也似乎成爲象徵彼此陣營的代表。事實上，在民主體系中，要是一半的選民把另一半選民當作是敵人，「沒有人會贏，大家一定都是輸」。近年來越來越極端的情感極化現象，如今已經成爲「民主危機」(crisis of democracy) (Przeworski 2019; Levitsky and Ziblatt 2018; Mettler and Lieberman 2020)。

其次，在多黨體系(multiple parties)的國家中，人民如何劃清「我群」和「他群」的界限？既有文獻大都奠基於美國兩黨政治的研究，但負面黨性不僅發生於兩黨制國家，在多黨制國家中負面黨性同樣也能影響選民的投票選擇。一旦選民討厭某個政黨，更容易於選舉時投票給其他政黨(Caruana, McGregor, and Stephenson 2015; Mayer 2017)。以荷蘭為例，Harteveld (2021)發現公民對某一個政黨的支持，並不會排斥對其他政黨的支持，只有當某政黨的意識形態與他的距離擴大，這種排斥感才會產生。另外，根據Kekkonen and Ylä-Anttila (2021)兩人針對芬蘭的研究，在多黨制國家中選民可被劃分為若干集團(bloc)，某些集團對某些政黨抱持積極的態度，但對其他政黨抱持消極的態度。這代表在多黨制的民主國家中，這種動態與複雜的負面黨性，不僅涉及個別政黨之間的關係，還涉及到所謂的超跨越黨派界限的情感集團(affective blocs)的關係。這不禁讓我們想問，在台灣當前的政治環境中，第三勢力（例如台灣民眾黨、時代力量等）是否能藉由選民對兩大政黨的負面黨性而有所突圍？

本文透過分析「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自2004至2020年間一共五波的台灣總統大選資料，發現在2012年後，臺灣確實和美國一樣出現情感極化和負面黨性加劇的現象。負面黨性對台灣選民的投票選擇，影響力已不小於傳統選舉研究中重視的統獨立場或省籍因素；即使在控制政黨認同後，仍具有相當強的解釋力。負面黨性不僅獨立於政黨認同，同時隨著近年來負面黨性選民比例的激升，我們無法忽視其對於投票選擇的解釋力。

負面黨性這種「討厭的力量」似乎已逐步成爲主導臺灣選舉的關鍵，令人擔憂這是否會讓政治菁英更加傾向利用極化議題進行選舉操弄與動員，甚至用醜化、栽贓等方式攻擊對方政黨或選舉對手（蕭怡靖 2019）。由於負面黨性選民對於特定政黨的強烈不認同，他們投給某政黨並不代表有多喜歡該政黨，單純是因為「討厭另一政黨」。Svolik (2019)即認爲，隨著政治極化的加劇，這些選民可能會忽視該政黨的所作所爲，只因爲「不願意讓討厭的政黨當選」。

我們也該關心在臺灣負面黨性擴大的過程中，是否會損害臺灣的民主？或者是否會導致民主去鞏固化(deconsolidation)？對此，本文認爲中間選民(me-

dian voters)的角色非常關鍵。英國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資深講師Claassen (2020)便提出「恆溫意見」(thermostatic opinion)的觀點。當民主走極端的時候，就會出現一股把它拉回來的聲音。改革太接近少數決民主模型(minoritarian democracy)時，多數決民主模型(majoritarian democracy)就會出來抵制。另外，Svolik (2019)實驗發現中間（或溫和）選民，對民粹領袖的懲罰比兩端的選民更加嚴厲，尤其民粹領袖推翻競選時的承諾時。因此，相較於具有對敵對政黨的負面黨性可能使有政策認同者更加極端，負面黨性對於中間選民可能有著正面效益、扮演「懲罰的工具」，將表現不適當的政黨排除在投票選擇之外。關於負面黨性現象的發展、社會基礎，以及其對於不同群體在其他投票行為的作用，將是未來值得我們研究的主題。

## 參考文獻

### I.中文部分

- 朱雲漢，2012，《2009年至2012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3/3)：2012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計畫編號：NSC 100-2420-H-002-030，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Chu, Yun-han. 2012. “2009 nain zhi 2012 nain ‘Xuan ju yu min zhu hua diao cha’ san nian qi yan jiu gui hua: 2012 nian zong tong yu li fa wei yuan xuan ju mian fang a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09-2012 (III): the Survey of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2012 (TEDS2012)*]. NSC 100-2420-H-002-030.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2020，《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誰將勝出？》，台北：遠見天下文化。
- (-----, 2020. “*Quan qiu hua de lie jie yu zai rong he: zhong guo mo shi yu xi fang mo shi shei jiang sheng chu*”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Fission vs. Fusion*].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 包正豪，2013，〈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陳陸輝（編），《2012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變遷與延續》，台北：五南出版。
- (Pao, Cheng-hao. 2013. “Zheng dang ren tong yu tou piao jue ze”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Vote Choice]. In “2012 nian zong tong yu li fa wei yuan xuan ju: bian qian yu yan xu” [*2012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s in Taiw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ed. Lu-huei Chen. Taipei: Wunan.)
- 李弘繹、張佑宗，2020，〈負面黨性與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2020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全球民主退潮？政治學的反思與應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2月5-6日，台北：臺灣大學。
- (Lee, Hung-I, and Yu-tzung Chang. 2020. “Fumian dangxing yu 2020 Taiwan zong-tong daxuan” [Negative Partisanship and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Presented at the 2020 Annual Conference of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December 5-6, Taipei.)

侯文詠，2004，〈《侯文詠極短篇》〉，台北：皇冠出版。

(Hou, wen-yong. 2004. “*Hou Wen-yong ji duan pian*” [*Hou Wen-yong Short Stories*]. Taipei: Crown.)

莊淑媚、洪永泰，2011，〈特定政黨不認同：臺灣地區民意調查中關於政黨認同的新測量工具〉，《選舉研究》，18(2)：1-29。

(Chuang, Shu-mei, and Yung-tai Hung. 2011. “*Te ding zheng dang bu ren tong: Tai wan di qu min yi diao cha zhong guan yu zheng dang ren tong de xin ce liang gong ju*” [A Study of Negative Identification against a Specific Party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8(2):1-29.)

張佑宗，2020，〈《臺灣社群媒體中的假新聞、同溫層與極化現象：一種人機整合創新的研究途徑》〉，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002-174-SS2，台北：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Chang, Yu-tzung. 2020. “*Tai wan she qun mei ti zhong di jia xin wen, tong wen ceng yu ji hua xian xiang: Yi zhong ren ji zheng he chuang xin de yan jiu tu jing*” [*Fake News, Echo Chamber, and Polarization in Taiwan'S Social Media: an Innovated Human-Computer Integrated Approach*]. MOST 108-2410-H-002-174-SS2.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游清鑫，2008，〈《2005年至2008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V)：2008年總統選舉面訪計畫案》〉，計畫編號：NSC 96-2420-H-004-17，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Yu, Ching-hsin. 2008. “*2005 nain zhi 2008 nain 'Xuan ju yu min zhu hua diao cha' si nian qi yan jiu gui hua: 2008 nian zong tong xuan ju mian fang ji hua a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05-2008(IV):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08 (TEDS2008P)*]. NSC 96-2420-H-004-17.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黃秀端，2004，〈《2002年至2004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I)：民國九十三年總統大選民調案》〉，計畫編號：NSC 92-2420-H-031-

004，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Hawang, Shioh-duan. 2004. “2002 nian zhi 2004 nian ‘Xuan ju yu min zhu hua diao cha’ san nian qi yan jiu gui hua: Min guo jiu shi san nian zong tong da xuan min tiao a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02-2004(III):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04 (TEDS2004P)]. NSC 92-2420-H-031-004.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黃紀，2016，〈2012年至2016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4/4)：2016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計畫編號：MOST 101-2420-H-004-034-MY4，台北：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Huang, Chi. 2016. “2012 nian zhi 2016 nian ‘Xuan ju yu min zhu hua diao cha’ si nian qi yan jiu gui hua: 2016 nian zong tong yu li fa wei yuan xuan ju mian fang a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12-2016(IV): the Survey of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2016 (TEDS2016)]. MOST 101-2420-H-004-034-MY4.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2020，〈2016年至2020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4/4)：2020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計畫編號：MOST 105-2420-H-004-015-SS4，台北：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2020. “2016 nian zhi 2020 nian ‘Xuan ju yu min zhu hua diao cha’ si nian qi yan jiu gui hua: 2020 nian zong tong yu li fa wei yuan xuan ju mian fang a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16-2020(IV): the Survey of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2020 (TEDS2020)]. MOST 105-2420-H-004-015-SS4.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Report.)

蕭怡靖，2014，〈從政黨情感溫度計解析臺灣民衆的政治極化〉，《選舉研究》，21(2)：1-42。

(Hsiao, Yi-ching. 2014. “cong zheng dang qing gan wen du ji jie xi tai wan min zhong de zheng zhi ji hua”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aiwan: An Analysis on

- Mass Feeling Thermometer toward Political Partie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1(2):1-42.)
- , 2019, 〈台灣民衆的黨性極化及其對民主態度的影響〉, 《台灣政治學刊》, 23(2): 41-85。
- (-----, 2019. “Tai wan min zhong de dang xin gji hua ji qi dui min zhu tai du de ying xiang” [The People's Partisan Polariz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in Taiwan].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2): 41-85.)

## II. 外文部分

- Abramowitz, Alan I., and Jennifer McCoy. 2019. “United States: Racial Resentment, Negative Partisanship, and Polarization in Trump’s Americ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81(1): 137-156.
- Abramowitz, Alan I., and Steven W. Webster. 2016. “The Rise of Negative Partisanship an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U.S. Elec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Electoral Studies* 41: 12-22.
- Abramowitz, Alan I., and Steven W. Webster. 2018. “Negative Partisanship: Why Americans Dislike Parties but Behave Like Rabid Partisans.” *Political Psychology* 39(1): 119-135.
- Bassan-Nygate, Lotem, and Chagai M. Weiss. 2022. “Party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Shape Affective Po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Natural and Survey Experiments in Israe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5(2): 287-318.
- Becker, Sascha O., Thiemo Fetzer, and Dennis Novy. 2017. “Who Voted for Brexit? A Comprehensive District-level Analysis.” *Economic Policy* 32(92): 601-650.
- Bermeo, Nancy. 2018. “Reflections: Can American Democracy Still Be Save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81(1): 228-233.
- Bolsen, Toby, and Judd R. Thornton. 2021. “Candidate and Party Affective Polar-

- ization in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he Person-Negativity Bias?" *Electoral Studies* 71: 1-8.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ruana, Nicholas J., R. Michael McGregor, and Laura B. Stephenson. 2015. "The Power of the Dark Side: Negative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4): 771-789.
- Claassen, Christopher. 2020. "In the Mood for Democracy? Democratic Support as Thermostatic Opin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4(1): 36-53.
- Cohen, Jacob. 1992.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 98-101.
- Druckman, James N., Matthew S. Levendusky, and Audrey McLain. 2018. "No Need to Watch: How the Effects of Partisan Media Can Spread via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1): 99-112.
- Fuchs, Dieter,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2019. "Globalization, Populism and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y." In *Democracy under Threat. A Crisis of Legitimacy?*, ed. Ursula van Beek.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 Garzia, Diego, and Frederico Ferreira da Silva. 2021. "Negative Personaliza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14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1961-2018." *Electoral Studies* 71: 1-11.
- Gidron, Noam, James Adams, and Will Horne. 2019. "Toward a Comparative Research Agenda on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Mass Publics." *APSA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sletter* 29(1) 30-36.
- Harteveld, Eelco. 2021. "Fragmeted Foes: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Multiparty Context of the Netherland." *Electoral Studies* 71: 1-16.
- Hetherington, Marc, and Jonathan Weiler. 2018. *Prius or Pickup?: How the Answers to Four Simple Questions Explain America's Great Divid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Hsiao, Yi-ching, and Eric Chen-hua Yu. 2020. "Polarization Perception and Support

- for Democracy: The Case of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55(8): 1143-1162.
- Iyengar, Shanto, and Masha Krupenkin. 2018. “The Strengthening of Partisan Affect.” *Political Psychology* 39(1) 201-218.
- Iyengar, Shanto, Yphtach Lelkes, Matthew Levendusky, Neil Malhotra, and Sean J. Westwood. 2019.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2(1): 129-146.
- Kekkonen, Arto, and Tuomas Ylä-Anttila. 2021. “Affective Blocs: Understanding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Multiparty Systems.” *Electoral Studies* 72: 1-12.
- Levi, Eugenio, and Fabrizio Patriarca. 2020.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opulism: The Municipality-Level Predictors of Electoral Outcomes in Italy.” *Economia Politica* 37(3): 833-75.
- Levitsky, Steven, and Daniel Ziblatt. 2018. *How Democracies Die: What History Reveals About Our Future*. 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Group.
- Martin, Gregory J., and Ali Yurukoglu. 2017. “Bias in Cable News: Persuasion and Polar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9): 2565-2599.
- Mason, Lilliana, and Julie Wronski. 2018. “One Tribe to Bind Them All: How Our Social Group Attachments Strengthen Partisanship.” *Political Psychology* 39(1): 257-277.
- Mayer, Sabrina Jasmin. 2017. “How Negative Partisanship Affects Voting Behavior in Europe: Evidence from an Analysis of 17 European Multi-party Systems With Proportional Voting.” *Research & Politics* 4(1): 1-7.
- McCoy, Jennifer, and Murat Somer. 2018. “Toward a Theory of Pernicious Polarization and How It Harms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Evidence and Possible Remed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81(1): 234-271.
- Medeiros, Mike, and Alan Noël. 2014. “The Forgotten Side of Partisanship: Negative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Four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7(7): 1022-1046.

- Mettler, Suzanne, and Robert C. Lieberman. 2020. *Four Threats: The Recurring Crises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Miller, A. H., Patricia Gurin, Gerald Gurin, and Oksana Malanchuk. 1981. "Group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3): 494–511.
- Pew Research Center. 2016.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Animosity in 2016." <https://www.people-press.org/2016/06/22/partisanship-and-political-animosity-in-2016/> (accessed June 22, 2021).
- . 2017. "In First Month, Views of Trump Are Already Strongly Felt, Deeply Polarized."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7/02/16/in-first-month-views-of-trump-are-already-strongly-felt-deeply-polarized/> (accessed March 16, 2021).
- Portmann, Lea, and Nenad Stojanovic. 2022. "Are Immigrant-Origin Candidates Penalized Due to Ingroup Favoritism or Outgroup Host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5(1): 154-186.
- Powell, G. Bingham. 1986. "American Voter Turnou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1): 17-43.
- Przeworski, Adam. 2019. *Crises of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hea, Joseph T. 1997. *Race Pride and the American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igelman, Lee, and Michael M. Gant. 1989. "Anticandidate Voting in the 1984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itical Behavior* 11(1): 81-92.
- Svolik, Milan W. 2019. "Polarization versus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30(3): 20-32.
- Tajfel, Henri. 1981.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uholski, Andrew. 2018. "American Antipathy: Partisanship and 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Empathy." *DeVry University Journal of Scholarly Research* 5(1): 8-18.

- Wang, Austin Horng-En. 2019. "The Myth of Polarization among Taiwanese Voters: The Missing Middle."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3): 275-287.
- Weber, Till. 2021. "Negative Voting and Party Polarization: A Classic Tragedy." *Electoral Studies* 71: 1-11.
- Zou, Hui, and Trevor Hastie. 2005. "Regularization and Variable Selection via the Elastic Net."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B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67(2): 301-320.

## 附錄

附錄資訊可於當期期刊出刊後，於《選舉研究》期刊網頁查詢。<sup>16</sup>

附錄一：相關變數測量題目及處理方式。

---

<sup>16</sup> 選舉研究期刊網頁網址：<http://www.jestw.com/tc/index.php>。

# Negative Partisanship and Voting Choice: The Case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Taiwan, 2004-2020

*Hung-i Lee\* and Yu-tzung Chang\**

## Abstract

The bitter rivalries that used to occur only among political elites have now reached the everyday lives of the mass public. In particular, the results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ave been driven as much by affective conflict between partisans as by policy debates.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aiwan through negative partisanship. Data from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etween 2004 and 2020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negative partisanship on election results. The study found that starting in 2012, there has been a rapid increase in negative views among partisans in both main parties toward the opposing party.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more than 40% of both Kuomintang (KMT) and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supporters showed negative partisanship towards the opposing party. Furthermore, supporters of both parties had the lowest ever favorability scores for the opposing party. Even when traditional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support for independence or reunification are controlled, negative partisanship still has significant explanatory power. The decision to vote for a candidate from a particular party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depends not only on one's long-term identification with that party but also on whether one harbors a strong negative opinion towards the oppos-

---

\* M.A.,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ing party.

**Keywords:** negative partisanship, affective polarization, presidential electio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Taiwan

